

中国近代思潮论

丁守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近代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员
中国近代思潮的思考	猿
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	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	员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论	猿
试论传统文化及其评论问题	猿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猿
关于传统道德的分析与继承问题	猿
从中西文化比较看中国近代化历程	猿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	猿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	猿
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潮	猿
革命党最早的《中国报》	源
《译书汇编》宣传西学提倡改革	源
《觉民》的启蒙思想	源

《武学》的尚武重学	源园
康有为“上书”的变法思想	缘园
论严复的自由思想	缘愿
对胡适研究的再认识	缘园
论瞿秋白的哲学思想	缘员
瞿秋白哲学思想中的矛盾论观点	远员
关于《历史研究》的若干回忆	远员
后 记	远愿

近代中国探索发展道路 的历史考察

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摆脱列强侵略和专制统治，中国先进分子曾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救国并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的出路。中国人民为摆脱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是却一再失败，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英勇顽强和复杂斗争，才逐步走上胜利的道路。在建设年代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是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思考的。

一、近代中国民族的灾难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四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东方乃至世界都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但是，从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以来，中国是大大落后了，以致于到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列强侵略宰割的对象。这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里，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地主剥削，农耕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始终没有多大改变，专制主义统治越来越严厉严密，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专制社会的宗法

等级制及其纲常礼教，严重损害人们的独立人格，束缚人们的自觉意识和主体观念，儒家教条、八股取士及“攻异端”、“息邪说”和接连不断的文字狱等文化专制主义，窒息人们的思想和任何创新精神，甚至人们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统治阶级日益衰败腐朽和没落，许多人只知文恬武嬉，整日处于醉生梦死之中。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明清时代虽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据说还不少，但由于官商压迫、高利贷盘剥、官府苛捐及轻商观念，发展极其缓慢，当它还未明显萌发出来，更远未成为社会的重要生产方式的时候，就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打断了。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列强侵略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变成它们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它们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种种手段侵略中国，掠夺中国，并且和中国封建专制势力结合起来，残酷地压迫中国人民，使独立的中国渐渐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帝国主义列强曾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如 1840 年的鸦片战争，1857 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战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战争，1904 年日俄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旨在掠夺中国东北的战争等。列强用战争打败中国以后，便强迫中国割地赔款，抢去了或“租借”了中国的许多块领土，索取了巨额赔款，强迫中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及诸多其他特权，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等。

帝国主义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在中国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还在一些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辖的

“租界”。它们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包括海上的、陆地的、内河的和空中的），从而能够大量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并使中国农业生产服从帝国主义的需要。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开办和经营了许多工矿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大销售市场，榨取高额利润，并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多方面的排挤和经济压迫，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中国政府借款或贷款，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中国金融，操纵中国财政。因此，它们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各种商行、公司，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形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中国广大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互动联盟，使地主阶级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重要支柱，帝国主义到处支持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保存其生存的基础，支持和保存封建势力及其官僚军阀的上层建筑，以便利统治中国。

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大量军火和派遣军事顾问，收买和操纵中国的军阀势力，造成中国长期的军阀统治、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并利用他们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帝国主义列强还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通过传教、开医院、办学校、出版报刊和吸引留学生等办法，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麻醉和奴役中国人民。

这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把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血迹斑斑的阴森可怕的图景。

还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报刊就曾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随意掠夺中国的种种手段和暴行，把中国遭受到列强侵略的悲惨情景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令人触目惊心。1904 年非官方的《外交报》列举了当时可以看到的足以表明中国殖民地化的一系列事实：

全国税务属于英人；

东清（即中东）铁路修筑权属于俄人；

山海关——新民屯铁路及山海关——天津铁路修筑权属于英人；

卢沟桥——汉口铁路修筑权属于比人；

天津——镇江铁路修筑权属于英人；

正定——太原铁路修筑权属于俄人；

天津——保定铁路修筑权属于英人；

山东铁路修筑权属于德人；

广州——汉口铁路修筑权属于美人；

江宁（即南京）——上海——杭州铁路修筑权属于英人；

江宁——汉口——重庆铁路修筑权将属于英人；

云南铁路修筑权将属于英人、法人；

福建铁路修筑权将属于日人、美人；

满洲矿产的开发权属于俄人；

河南北部及山西矿产的开发权属于英人、意人；

山东矿产的开发权属于德人；

安徽矿产的开发权属于英人、日人；

四川矿产的开发权属于法人；

云南矿产的开发权属于英人；

福建矿产的开发权属于日人、法人；

天主教徒属法人保护；

耶稣教徒属英人、美人保护；
佛教徒将属于日人保护；
凡大商家都用外人为代表；
凡达官贵人都有外人为奥援；
政府借外债，都以国家主权为抵押；
商人因银根紧急，向外国银行借款，亦各以所有财产为抵押；
轮船公司和钢铁厂等由外国人经营；
等等。

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极大恐慌，使他们看到中国已陷于“谓之不亡不可，谓之亡亦不可”的境地。因为如果说中国没有亡，那么它的许多主权是属于外国的；如果说中国已经亡了，那么它在名义上仍然存在。这就是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悲惨情景。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华民族遭到了极大的灾难，我们可爱的祖国遭到了野蛮的蹂躏和践踏。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

二、艰难的探索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中国先进分子曾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学说，探索能使中国独立富强和发展的道路，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和实践活动。

还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就开始抨击社会腐败，危机四伏，“日之将夕，悲风骤起”，已处于“衰世”状

态。要求变革，并引用《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加强变革的要求。同时提出“开眼看世界”，注意西方的事物，翻译西书西报，编写《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介绍外国的情况，主张“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技术，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批评了顽固分子所谓的“奇技淫巧”，指出“有用之物，即是奇技而非淫巧”。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但是在专制统治下，他们的活动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在这以后，徐继畲、梁廷枏也先后发表《瀛环志略》、《海国四说》，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及当时状况，谈到美国的民主制度、国会法制，流露了对民主政治的向往。

洪秀全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某些平等思想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相结合，成立拜上帝会，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分土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对平等自由的向往。然而农民是小生产者，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理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单纯的农民战争也不可能战胜封建专制主义和外国列强的联合势力，终遭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提交的《资政新篇》。他曾在香港住过几年，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认为应该效法西方国家，发展工商、厂矿、交通、邮政、金融、医院、学馆等企业事业，并介绍欧美国家的民主选举，建议“设新闻馆，以取民心公议”，礼纪伦常及各种活动，“均宜立法以为准”等。1861年，冯桂芬写的《校邠庐抗议》，要求清政府实行变革，提倡“采西学”、“制洋器”，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交通金融等事业。他还将中西内政作比较，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君民

“相隔”正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反映了他对专制的不满。洪、冯两人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主张学习西方，发展经济技术和改革中国旧政，则是相通的。这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在中国也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能沿着崎岖的道路发展。

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认识中国的军事、经济都落后了。他们虽然并不想改变中国的专制统治，但为适应“中外古今的大变局”，也认为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以“借法富强”。李鸿章说：“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商为本。”于是搞起洋务运动，开办一些工矿铁路邮电等事业和军工技术学堂。洋务派知识分子进而认识到，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不但要发展船炮工商，还应该实行变法，改变政治制度。王韬、郑观应认为君主专制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仅有害于民，亦有害于君，“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所以必须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或“君民共主”。薛福成、宋育仁、宋恕等还提出设议院，通下情。他们还提出广设学校，多开报馆，造就人才，广听远闻。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号召发动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联合在京科考的举子们“公车上书”，要求拒和（反对割让台湾）、迁都、练兵、变法，革旧图新，可谓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他们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国，岌岌哉！”提出要救国只有维新，变法维新是

救国富强的必由之路。以后他们又多次上书，要求变法，提出改革方案。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和学堂，积极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思想，主张倡西学，兴民权，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工商业，改变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试图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自上而下对中国实行改革。维新派是努力要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进步的。但由于他们自身力量薄弱，以及他们所要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加之他们对某些改革也有些过急，如希望很快设置制度局及其十二支局以代替原来的六部等机构，引起旧官僚们的极大不满和恐惧，结果被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势力所扼杀。“百日维新”的失败，表明中国和平改革的道路行不通。

继起的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中下层反对列强压迫，要求独立发展的情绪增长；而由于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又扩大了新型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迫切要求新的出路，因此，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特别是在八国联军战争失败并签订辛丑条约以后，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的面貌更加暴露的时候，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走上了主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1905年，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确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第一次宣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革命党人热情地鼓吹革命，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揭露列强侵略，抨击清政府卖国，是“洋人的朝廷”；同时联络会党，争取新军，举行多次武装起义。许多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奋不顾身。终于在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势力的支持下，政

权很快落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手里，并开始了军阀统治、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时期。

三、民主和科学的启蒙

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并在民元约法中宣布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然而政权很快落入军阀手中，仍然是专制主义那一套。正如当时有人在诗句中说的“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宪法、国会成为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的玩物和争权夺利的工具。各派和各地军阀都在利用自己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自己的势力，军队数量不断增多。在清末陆军不过 36 个师，到 1913 年增至 90 个师，96 万人。正规的军费在北京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1913 年是 26.89%，1919 年上升到 41.68%，这已经是惊人的，而额外的军费数量还要大得多。可以说各个军阀都是横征暴敛，竭尽搜刮之能事。至于官僚、政客，正如当时有人所描述的：“官僚以刷新政治所期许，于是帝政末年之官僚，一变而为共和开幕之官僚，臣服一姓之官僚，一变而为国民公仆之官僚。究之，人犹是人，官犹是官，即政治亦犹是政治。其所改革者，位阶职务之名称，簿书文告之程式，而其所不可改革者，即为官吏之个人。”至于政客，那便是“惟利是视，不顾利害，不知轻重，不择手段，破坏叫嚣，大为识者良民所恶”。陈独秀后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除三害》，就是指的军阀、官僚、政客这三类东西。有个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也参加了政府，那也不过是当军阀政府的点缀物而已，并没有什么实权。

袁世凯在掌握政权后，不久就由临时总统成为正式总统，在镇压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他便修改约法，当了终身总统，为其称帝铺设道路；并且发表“整顿纲纪”的宣言，恢复学校“祀

孔”、“读经”，及表彰“节烈”、“孝行”。他还公开进行“祭天祀孔”，说什么“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行，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祭孔告令》）。从思想上为帝制作张本。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出现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公开宣传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封建余孽大肆叫嚷恢复帝制，“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已经成为封建卫道者的康有为，从1913年起就在他主编的《不忍》杂志上表示不忍“纲纪之亡灭”、“国粹之丧失”、“教化之陵夷”、“人心之堕落”，高唱“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滥调。在社会上，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之类团体纷纷出现。“孔子大一统”说、“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等谬论，风行一时。在反动势力的庇护下，鬼神迷信之说盛行，许多地方公开设坛扶乩，《灵学》杂志也公然在上海出版，胡说“鬼神之说张，国家之命遂促”，闹得国家乌烟瘴气。这种状况引起一些先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他们经过悲痛和沉思，毅然奋起，发动了一场新文化启蒙运动，震动全国，尤其在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

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号角。它一开始就在发刊词性的《敬告青年》中历数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痛斥了专制主义的罪恶，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希望青年猛省，奋起斗争。并向青年陈述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当时民主被称为“人权”，“人权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欧洲近世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奴隶之

羈，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提出政治解放、信仰解放、经济解放、伦理解放。又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述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思想云为一尊理性，而迷信斩焉，无知妄为之风息焉。”当时的“赛先生”主要还不是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坚持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反对迷信愚昧、偶像崇拜，帮助“德先生”反对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的斗争。在那时的“赛先生”已超出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范围，如果离开了“德先生”来评论“赛先生”，就很难触及问题的本质了。

《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就在袁世凯称帝时，它就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因此，“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并且指出：所谓国民政治、立宪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惟一根本之条件。”同时指出，欲实行民主政治，还必须在伦理上废除纲常阶级制。“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为了广大国民觉醒，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新青年》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发挥重要启蒙作用。

由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是打着尊孔的招牌。因而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很快指向了维护专制统治的儒学孔道。他们并不是否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且称他自是当时之“伟人”。而是由

于：（一）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礼教、生活态度、政治主张，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不适于现代生活。（二）着重批判了儒家的尊卑贵贱、纲常礼教，指出那是“奴隶道德”、“吃人礼教”，是“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此不攻破，吾国则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三）反对文化专制，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用一部分的一部分包揽一切，定于一尊，只能使中国落后，无由进步。《新青年》还反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提倡生动活泼、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反对僵化的文言文，提倡通俗的白话文。反对旧戏，提倡新戏、文明戏。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鬼神迷信、拜佛求仙、卜卦扶乩，批判“灵学”和偶像崇拜等。当时先进分子尤其鼓励青年思想解放，着重宣传“要独立自主人格，平等自由人权”；要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言论自由！那声音真是振聋发聩，扣人心弦，呼人猛省，催人猛进。起了巨大启蒙作用。

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加紧，它不但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还借口对德宣战占领我山东青岛，而西方列强却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进行偏袒，因而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轰动全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政治斗争超越了思想运动。这自有当时的情况。然而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过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民主和科学的呼喊。

四、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中国近代思想家向西方国家学习，主要是学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又由于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受到工人运动的冲击，也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从而对资本主义采取某些批判的态度。正是历史前提的差

异，造成了这种矛盾的现象。

还在 19 世纪末，外国人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在介绍欧洲社会主义时就讲到马克思：“德国讲求安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称马克思为欧洲著名的“百工领袖”，“主于资本者也”，其著作“语语翔实，讲求政治家至今终无以难之”。他们是把马克思学说当作“安民新学”介绍的。20 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也谈到社会主义，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泰斗”，“著述甚多”，并称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破除“国界”、“级界”、“产界”、“苦界”等九界，以实现“太平大同”的理想，显然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可能的。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犹未必能行之。”他认为“中国宜酌采社会改良主义”。

革命派也谈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译书汇编》、《浙江潮》、《国民日报》等都曾介绍社会主义思想。马君武谈，马克思是“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常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邓实认为“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焉，则社会主义是也”（《论社会主义》）。《浙江潮》则最早谈到“共产主义”，以马克思为代表。朱执信在《民报》发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指出“马尔克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宋教仁、叶夏声等也都谈到《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天义报》最早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并在译序中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移之说也。”孙中山看到“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为防止资本主义的“祸患于未萌”，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